

审美与现代

中国现代印象批评研究

王青/著

The Aesthetic and the Modern

A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Impressionist Criticism

以中国现代印象批评作为研究对象，
将其放在审美建构与现代性追求的
双重视域下进行思考，
从发生机制、话语与文本、批判家的创造、
批评的现代性等诸多方面，
重点考察中国现代印象批评对于
中国现代诗学的价值和意义。

研究内容

The research content

中国现代诗学发生的文化背景；
主要从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时的社会语境与
文化语境入手，
探讨中国现代诗学发生的可能性。

西方印象主义批评本土化之路；
主要梳理西方文艺理论的译介，
尤其是西方印象主义批评与
中国古代意象（品评）批评的契合之处，
以及中国现代印象批评的萌芽。

中国现代印象批评的建构；
主要讨论在政治与审美纠结之中，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于西学、
传统、新知的融会与创新。

中国现代印象批评的实践品格；
主要从批评实践、审美自主、精神品格
等方面探讨其对中国现代诗学建构与发展
中的贡献。
中国现代印象批评的生存的文化生态空
间；主要从文化生态的角度，
分析当时不同批评间的互竞、互补，

以及批评家、作者、读者间的互动关
系。中国现代印象批评的当代意义；
针对当下文学批评的现状提出问题，
并讨论中国现代印象批评对当代文学
批评的意义与价值。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审美与现代

中国现代印象批评研究

王青/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审美与现代:中国现代印象批评研究/王青著. —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4.6
ISBN 978-7-207-10046-7

I. ①审… II. ①王… III. ①诗歌评论—中国—当代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52473 号

责任编辑:李 珊
装帧设计:徐威波 颜 海 陈新格

审美与现代:中国现代印象批评研究

王 青 著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
邮 编 150008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电子邮箱 hljrmcbs@yeah.net
印 刷 黑龙江艺德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5.75
字 数 22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7-10046-7
定 价 38.00 元

网络出版支持单位:东北网络台(www.dbw.cn)

(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印刷厂负责调换)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律师赵学利、赵景波

目 录

引论 中国现代批评理论发生的文化背景	(1)
第一节 批评理论的现代性问题	(1)
第二节 现代文学批评的现代化选择	(8)
第一章 中国现代印象批评研究综论	(14)
第一节 中国现代印象批评研究述评	(14)
第二节 中国现代印象批评研究现状及反思	(19)
第三节 中国现代印象批评的研究目标	(27)
第二章 中国现代印象批评的雏形	(30)
第一节 五四时期文化空间的开创	(30)
第二节 东西方视野中的印象批评	(38)
第三节 五四时期对西方印象批评的接受	(49)
第三章 中国现代印象批评生长环境与批评空间形成	(62)
第一节 现代印象批评的生长环境	(63)
第二节 文学批评中的媒介角色	(72)
第四章 中国现代印象批评者的立场与策略	(89)
第一节 整合中西方文化精神资源	(89)
第二节 坚持文学独立性的批评立场	(97)
第三节 注重体验的印象式批评方法	(106)
第四节 审美追求与社会关怀交融	(115)

第五章 中国现代印象批评的话语实践	(122)
第一节 文学的批评与批评的文学	(123)
第二节 含英咀华：李健吾的文学批评	(130)
第三节 象征的灵境：梁宗岱的文学批评	(142)
第四节 抽象的抒情：沈从文的批评	(151)
第五节 “感情的型”：李长之的文学批评	(161)
第六节 印象批评的后续者：唐湜的文学批评	(171)
第六章 中国现代印象批评与他者的关系	(178)
第一节 边缘批评与主流批评的互补	(178)
第二节 自由主义立场下批评间的互竞	(189)
第三节 批评家与作家、读者间的互动	(197)
第七章 中国现代印象批评的当代意义	(205)
第一节 对当代文学批评现状的反思	(206)
第二节 在对话中完成文学批评	(209)
第三节 强化文学批评的体验性	(212)
第四节 建构交往式的批评文本	(217)
附录	(221)
双重视野下的中国文学精神	
——论钱穆的文学思想	(221)
生态文学批评：家园意识与理论自觉	(229)
参考文献	(238)
后记	(246)

引论 中国现代批评理论发生的文化背景

中国现代批评和中国现代文学一样,自20世纪初期进入了现代转型时期。中国现代批评的现代化过程,是强烈地摆脱中国古典文论的羁绊,热烈地表现出对西方文艺的认同的过程,是告别古典拥抱西方,以西方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作为参照系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西方的文艺思潮与文学批评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助推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萌芽与建构。

第一节 批评理论的现代性问题

“现代”一词在西方较多地被认为是一个时间的概念。韦勒克认为:“英文中‘现代’这个术语至今还保留着早期的意义,凡与古代相对,从中世纪以来的一切均可称作‘现代’。”^①此后,人们习惯将一切与新的生活方式、新的人格心理结构,都看作与“现代”的概念有关;“现代化”则意味着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革。在《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对现代化的解释是:“现代化:指从一个传统的乡村的农业社会转化成一个非宗教的城市工业社会。”^②工业化、城市化、个体化成了现代性的标志,它既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又给人们带来了灾难性的影

① [美] 韦勒克:《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的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53页。

② 《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1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281页。

响。西方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告别旧的传统社会的过程。

对于“现代性”，不少学者也看法不一。“现代性(modernity)，是指现代的本质，是一种理念；它与现代的表现(现代化)不同”^①。福柯将“现代性”看作“一种态度”，认为：

人们是否能把现代性看作为一种态度而不是历史的一个时期。我说的态度是指对于现时性的一种关系方式：一些人所作的自愿选择，一种思考和选择的方式，一种行动、行为的方式。它既标志着属性也表现为一种使命。当然，它也有点像希腊人叫作ethos(气质)的东西。^②

现代性作为一种推动现代化的精神力量，具有三个层面，即感性层面、理性层面和反思超越层面。就西方而言，现代性首先是指一个特定时期，主要指18世纪以后的西方历史，它标志着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历史巨变中形成的新的时代意识。西方学者马克斯·韦伯、哈贝马斯、吉登斯等都提出了自己对于现代性的理解。在吉登斯看来，现代性意味着“时间的虚化”、时空的分离以及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再有就是反思性。这些都是西方自工业社会以来形成的社会环境、文化环境的变化。时空分离导致了时间的虚化、时间的重组。“机械钟(最早出现在18世纪后半期的计时方式)的发明和在所有社会成员中的实际运用推广，对时间从空间中分离出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同时“时—空分离为现代社会生活的独特性特征及其合理化组织提供了运行的机制”。^③

至于“现代性”对于人的层面的改变，齐格蒙特·鲍曼认为，现代

① 杨春时主编：《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

② [法]米歇尔·福柯：《何为启蒙》，顾嘉琛译，参见汪民安等主编《现代性基本读本》，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52页。

③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4～17页。

性“就是一种个体化的、私人化的观点,编造模式的重担和失败的责任都首先落在了个体的肩上”,“当时间和空间从生活实践中分离出来,当它们彼此分离,并且易于从理论上解释为个别的、相互独立的行为类型和策略类型时,现代性就出现了。”^①鲍曼从个体的人的角度论述了现代性给人带来的变化,进而造成了社会的变革。舍勒则认为,现代性源自于一种“怨恨”心理:“在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中进步向前,并不是实干精神,不是资本主义中的英雄成分,不是‘具有王者气度的商人’和组织者,而是心中充满怨恨的小市民——他们渴求最安稳的生活,渴求能够预测他们充满惊惧的生活,他们构成了松巴特恰到好处地描绘的新市民德行和价值体系。”^②舍勒强调了现代性与人的感性心态的关系,即人因为欲望不能满足而生发出的追求享乐与物质消费的心理。

西方学者把现代性分成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典型的是卡林内斯库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谈到的两种截然不同又相互冲突的现代性。一种是作为科学技术的进步、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带来的全面经济社会变化的产物,另一种是作为美学概念的产物。前者是资产阶级的现代性概念,而且在中产阶级建立的胜利文明中作为核心价值观念保有活力、得到弘扬。后者导致了先锋派的产生,倾向于激进的反资产阶级态度,表明文化现代性对资产阶级现代性的公开否定。^③卡林内斯库认为:两种现代性形成了一种对立冲突,第一种现代性是此前现代观念的继续,它以进步为旨归,关注时间,崇尚理性,相信科学能给人们带来最大的福利和满足,相信人文主义框架中的自由和理想,追求实用主义,代表了中产阶级的价值观。相反,另一种现代性便是一种审美的现代性。其价值观念就是:“个人的、主观的、想象性的

① [英] 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上海三联书店 2002 年版,第 13 页。

② [德] 舍勒:《资本主义的未来》,刘小枫编,罗悌伦等译,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5 页。

③ [美] 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 2002 年版,第 48 页。

绵延,亦即‘自我’的展开所创造的私人时间。”^①它是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一种反动。

中国的现代性则不同,是一种外发型的现代性。中国的现代性从西方引进,又打上了自己特殊的烙印。经历了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层面的批评和反思。金耀基认为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可分为三个层次:器物技能层次的现代化、制度层次的现代化、思想行为层次的现代化^②。学者王一川则认为中国现代性建构经历了五次重心转移,即技术重心、政体重心、科学重心、主权重心、经济重心^③。

无论是分几个层次,中国在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其历史经历了从“洋务运动”到“变法维新”,从孙中山发起辛亥革命,最终在体制上推翻了封建政权的变革。但是,这一系列的变革并没有最终根除封建社会的根基。这也说明了中国向西方学习现代性的探索的复杂性。

就一个不发达的国家来说,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无一不是以发达国家作为自己的参照。鸦片战争打破了封闭的封建制中国,强行引进西方文化,把中国纳入世界的现代化进程。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知识分子痛感国家的衰败、政府无能、百姓愚昧,越发激起他们变法图强的意志。皮嘉祐在戊戌变法期间曾写过一首《醒世歌》:

若把地球来参详,
中国并不在中央,
地球本是浑圆物,
谁居中央谁四旁。^④

这首诗形象地说明了当时人的心理:鸦片战争改变了人们的大国意识,世人不再坚持中国中心论,进步的知识分子在与西方的参照中

① [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1页。

② [中国台湾]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广州文化出版社1989年版,第117页。

③ 王一川:《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2~27页。

④ 转引自王一川《中国现代学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7页。

看到了自己的不足、落后,“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思想就形成于此时。中国人不仅学习西方的科学还要学习西方的民主精神和文化思想。于是,就有严复通过《天演论》向国人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传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念;王韬外游后,于1874年在香港极力通过办报纸的方式,发表政论性散文,以此传布新的思想;梁启超在变法失败亡命日本后,感受到小说对改变人的观念的作用,进而提倡“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此时的知识分子在从传统的经学体制中游离出来之后,正通过结社、学会、办报等形式形成了一种类似西方的“集纳”的态势,新的视界、新的组织、新的传播形式,使新的思想在此基础上萌动、生发、集结、传播。报业的兴盛、实践,为传布现代变革思想提供了平台,也为新知识,新兴社会思想资源的组织开辟出新的疆域。“它既是现代化的全民总动员的载体和工具,也是一个民族‘现代性’实践的标志,中国近代报业的兴起在其后的政治和文化实践中被证明是中国现代性历史实践的一个重要开端。”^①

从文学的角度看,梁启超和王国维两人典型地代表近代社会转型期的知识分子文学观。1898年到1907年,梁启超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倡导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把“新民”、“营构民心”当作启蒙的首要任务。梁启超把文学革命和政治现代化的目标结合在一起,在《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中指出: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②

在《告小说家》等文中,梁启超认为小说“营构人心”的功效甚大,具有“熏”、“浸”、“刺”、“提”四力,完全可以作为最有效的新民工具,可以直接引发受众观念上的革命。梁启超系列论文的历史意义,在于

^① 程光炜等:《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4页。

^②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77页。

提升了小说在文学中的地位,推动晚清小说的创作和翻译,并大大强化了知识分子用文学唤醒国民的意识。学者陈建华指出:“梁氏‘小说’概念以‘群治’为核心,勾画了一个作为未来中国蓝图的‘想象共同体’,与‘革命’、‘进化’等话语层次相交错,构成一种文化‘整体’(totality)的‘迷思’(myth)。”“在帝国危亡,意识形态一度出现真空之际,小说骤登大宝,给受伤的民族心灵带来了某种解药之故。”^①的确,我们今天阅读梁启超当时的论著,文中的话听来依然掷地有声,让人能强烈地感受到言说者的紧迫感。

与梁启超不同,1903年至1908年间,王国维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来阐述他的文学观,他的依据是西方现代哲学和美学的观点,尤其是康德、席勒的美学和叔本华的哲学。在《论哲学家与美术家的天职》、《〈红楼梦〉评论》、《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人间词话》等一系列重要论著中,王国维提出了一套全新的思路以及研究方法,如“夫天下有最神圣、最尊贵而无与于当世之用者,哲学与美术是已。”^②王国维从读者熟悉的《红楼梦》以及唐宋诗词入手,运用西方的文艺批评方法加以阐释,既给读者传播了新的批评方法又赋予古代文学经典以现代意义。例如,他借用叔本华的“意志”说来评价《红楼梦》,认为现实生活中的“‘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要想超然于意志欲望不能满足而造成的痛苦,只有“美术”(艺术)最合适,“艺术之美所以优于自然之美,全存于使人易忘物我关系”。《红楼梦》的厌世解脱精神是“哲学的也,宇宙的也,文学的也”,是悲剧之最上乘者,是“悲剧之悲剧”^③。他的《人间词话》同样借助西方的文学批评方法,标举境界为诗论的中心概念,将境界分为两类:“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现实二派之所由分。”^④

① 陈建华:《从革命到共和:清末至民国时期文学、电影与文化的转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7页。

② 王国维:《论哲学家与美术家的天职》,《王国维文集》第三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6页。

③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王国维遗书》第5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第42~44页。

④ 王国维:《人间词话》,施议对译注,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3页。

王国维表现出明确的文学自主意识,特别是他强调文学在社会功利之外,具有独立自足的审美价值。与梁启超更看重文学的社会作用的功利主义立场不同,王国维更强调文学的审美价值。在整个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发展中,可以清晰辨出现代工具主义与现代审美主义两种路径的此消彼长,而这种此消彼长又和中国社会的革命斗争形式息息相关,梁启超与王国维的文学观念与文学思想影响深远。

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具有反传统的文化选择意识。他们的视野、胸襟、气度都比晚清知识分子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他们初步形成了世界的眼光和本土意识。世界的眼光,就是不落后于20世纪先进的政治、文化与科学发展的潮流;本土意识,就是在重建民族文化的同时,不能忘记立足于自身民族的文化传统。这样,吸收外来文化以发展本民族文化,成为先驱者共同的价值取向,也是他们批判封建文化传统、重建民族新文化的尺度。

从五四知识分子的内心深处来看,他们迫切要进行文化观念、政治制度上的变革,好以崭新的面貌回应新时代的召唤。在反传统的过程中,五四知识分子以西方文化作为参照系,激进地反对传统中不符合现代性追求的一面,抛弃旧的东西,同时急于树立现代人的新形象。对于西方文化,他们采取“拿来”的态度,如鲁迅提出“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拿来”的“拿来主义”。鲁迅用接受旧屋子来做比喻:“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敢,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己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①鲁迅特别强调了对于西方文化接受中的主体作用,这种接受者的主体作用表现为对于西方文化在接受中的创造性转化。

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建构期,大量的西方文艺理论会共时性地进入国门,浪漫主义、古典主义、现实主义和西方正在盛行的现代主义包括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一起进入国人的视野。《新青年》、《东方杂志》、《少年中国》以及改版后的

① 鲁迅:《拿来主义》,《鲁迅选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页。

《申报·自由谈》这些拥有大量受众的报纸杂志都有意识地辟出版面介绍这些主义。这样，也造成了五四时期像走马灯一样川流不息、相互更迭的复杂的思想潮流。五四文学建设者们在接受外国文学影响方面表现出强烈的主体精神、开放的气度和宽容的心态，他们大量“占有”各种文艺思潮的思想成果，积极消化适合于自己审美脾胃的营养成分，结果使外国“近代文学的各种‘-ism’都在我们文坛上起过或大或小的泡沫，然而已不是此兴彼仆的递代，而是同时交流，成为一大漩涡”^①。

此时，中国传统文化已经发展到僵化的阶段，五四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采取了摒弃的态度。但是，他们不可能彻底否定民族精神中的合理因素，也不能否认传统文化对自身的影响。那些积淀在民族心灵中的传统文化精神，也共时态地积淀在他们自己身上，导致他们背负着传统又激烈地反传统。由于与传统的切断，五四知识分子也处在文化身份认同的焦虑之中，以至于在建设新文学的过程中，也包括现代文学批评的建构中，传统文化的因素一直如影随形地影响着他们的行动。

因此，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现代性追求与民族精神重铸是同时进行的。在民族启蒙和社会变革中，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部分的现代批评理论是与现代文学同时生长，同时，在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民族化进程中，文学批评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第二节 现代文学批评的现代化选择

中国现代文学在现代化与民族化的发展进程中，需要文学批评及时予以关注，同时读者的阅读品味、期待视野、接受能力也需要引导、培育，特别是对于已经养成阅读习惯的传统读者来说，更需要批评者的引导。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作为被启蒙的大众，他们时而困惑、时而彷徨

^① 茅盾：《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茅盾全集》第2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41页。

徨,或是觉醒、或是守旧。对于新文学,他们感受着其表现的时代精神,同时也被这种新形式、新文体所震撼。与此同时,守旧势力对新文学的攻击也会使一些读者失去判断力。所以,这一过程中的文学批评担负着扶植新文艺、引导创作、培育读者的重任。例如:当郁达夫的《沉沦》发表时就曾引起封建卫道士的强烈不满,认为有“黄色”描写,海淫海盗,郭沫若评论说:“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的闪击”,“这种露骨的率真,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①周作人也在《晨报副刊》上以“仲密”笔名发表《自己的园地·〈沉沦〉》,对其积极意义予以肯定。而当郭沫若的《女神》发表时,其诗歌中蕴育的强烈的时代精神,对个性的张扬都是以往诗歌中所没有的。此时,闻一多用两篇有分量的评论为其撑腰,这就是著名的《〈女神〉之时代精神》与《〈女神〉之地方色彩》。闻一多肯定了《女神》的时代精神,说《女神》真正是新诗,不独新在形式上与旧诗词相去甚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20 世纪底时代精神”,包括“动的精神”、“反抗的精神”、“科学的成分”、“世界大同的色彩”和“当时青年的烦恼悲哀”。^②而《〈女神〉之地方色彩》则批评了《女神》缺少“地方色彩”和“欧化”现象。闻一多的评论奠定了《女神》在文学史上的经典地位,也对当时读者的阅读起到很好的导向作用。

在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期,文学批评不仅起到扶植新作、引导读者的作用,更担负着批评的理论建构作用。此时的文学批评家具有强烈的使命感与责任感,他们要用自己的批评活动为新文学的发展开路,同时在这一过程中逐步确立现代批评的独立品格与独立地位。域外文艺思潮、批评方法的大量引进,使得批评者可以用西方现代文艺批评方法阐释国内的新文艺创作,并做出理性的分析。此时的文学批评不再是中国传统的批评方法的现代移植,也非是西方文艺理论的照搬照抄,而是初步具备了自己的品格,受着西方文艺理论的影响,与中国古代文论有着难以割舍的关系。一方面,在批评方法的使用上,它

① 郭沫若:《论郁达夫》,《沫若文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547页。

② 《创造周报》1923年6月第3号。

运用了西方的批评理论术语,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批评,西方的印象主义批评等;另一方面,在表现文类上,它明显不同于中国古代文论的评点、以诗评诗的方式,在批评方法、批评术语、批评视角以及批评文体上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不同,运用了科学的批评方法,从理论层面,运用学术术语完成整个批评过程,从而使批评打上了现代性的特点。五四时期的文学批评,已经逐渐抛弃了点评、夹注等旧的模式,而代之以现代意义上的逻辑分析、推演、归纳的论述。但是,此时的文学批评,仍缺乏理论建构,批评文章多为美文式的即兴批评。

正如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一直存在一样,现代文学批评理论在建构与发展过程中,虽然传统的古代文论面对现代西方文艺理论已经失去了言说的能力,但是古代文论的精神内质一直影响着现代文学批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讲求批评的体验性、感悟性,注重对读者的引导作用;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并无固定的批评术语,使用的批评概念也有着多义性、模糊性的特点,而且还经常以人性化的术语如“风骨”、“神思”、“肌肤”等作为隐喻,引导读者参与到作品的品鉴、欣赏等再创造活动中。总之,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立足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具有本土性、民族性的特点。但是,这种批评方法发展到近代,已经明显不能就新的创作文体、创作思想展开批评,如一些论者所言:

儒家经学作为古代文学理论发展的源头,打造了传统的文学研究上的思维定式,制约着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其理论思维的特点,多好托经立义,即使总结文学实践中的新经验、新成就,也必定要从儒家经典中寻找理论的根据,甚至把儒家经典中的观点作为判断理论是非的标准,以致形成了原道、宗经、征圣的思维定向,使理论思维很难体现出根本性的突破。而以老庄思想为根底的古典审美诗文理论特征则天马行空,强调感悟、隐喻和意境,虽然有其符合文学的特点和规律之处,但其文学理论批评所表现出来的触物引申、随感而发的主观随意性及范畴、概念的模糊性和忽视严密逻辑性等特点,也不利于理性思维和科学的文学理论

批评的发育、成长。^①

尽管如此,我们仍能从现代文学批评中看到古代文学批评的影响,这种千丝万缕的联系如影随形,这种精神上、血脉上的联系始终存在,所以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批评家常常表现出思接古今、纵论东西的特点。在宗白华著名的《论文艺的空灵与充实》一文中,作者写道:

艺术心灵的诞生,在人生忘我的一刹那,即美学上所谓“静照”。静照的起点在于空诸一切,心无挂碍,和世务暂时绝缘。这是一点觉心,静观万象,万象如在镜中,光明莹洁,而各得其所,呈现着它们各自的充实的、内在的、自由的生命,所谓万物静观皆自得。

.....

空明的觉心,容纳着万境,万境浸入人的生命,染上了人的性灵。所以周济说:“初学词求空,空则灵气往来。”灵气往来是物象呈现着灵魂生命的时候,是美诞生的时候。^②

这段文字阐释了艺术与人的心灵的内在契合,人的生命体验与艺术之境相互映照,美感油然而生,人的审美直觉、审美体验来自于人的生命感悟。宗白华阐释的概念是西方的、现代的,但是论证的过程和使用的例子是东方的、古典的。他用现代论文体弘扬中国古代文化精神,看似无拘无束的评论,却蕴含着丰沛的内容。宗白华通过自己的批评实践思考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在现代语境下的出路,中国的传统文化怎样才能在与现代文化的碰撞中激发新的活力的问题。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具体实践反映出批评者的古典情结,但是,批评家们并无意返归古典,相反,他们拥有全新的现代精神,他们渴望接受西方文明的洗礼。与此同时,传统文化在现代文学批评中的绵延说明了它并没有与现代批评完全割裂,相反,它以一种融合的方式存

① 陈传才:《文艺学百年》,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8页。

② 宗白华:《艺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76~177页。

在于其中。学者王一川认为这种新融会的主要资源有：现代文化变革的压力，西方理论权威的感召，现代文学变革中的要求，古典传统的影响。^①进而，他认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从文体、视角、精神、遗韵等诸方面或隐或显、或多或少地打上古典批评的印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借助报纸杂志等传媒译介传播的西方文学作品和文艺理论刷新了国人的眼光，也成为文学变革、现代文学批评建构的有利资源。在中国与世界的交往中，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被中国知识分子拿来作为反抗传统的武器，绵延千年的古典文化自然抵不过西方文化的强劲势头，然而，不少传统的东西也绝非消亡，而是在现代语境中被重新激活，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存在。在批评者的思维模式上，在批评视角的选择上，在批评文本的内在精神气质上都有或多或少的表现。

古典文化精神得以存在的原因，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深厚的国学底蕴以及家学熏陶的结果。本论题所讨论的是倾向于印象批评的京派批评家，虽然多数有西学背景，然而，中国古典文化的底蕴是不容忽视的。朱光潜、李长之、李健吾、梁宗岱等都有留学西方的经历，西方文化深刻地影响着他们的文学批评方式，但是，从幼年到青年成长中所接受的古典传统的熏陶，让他们和庄子、屈原、李白、陶渊明在精神上形成共鸣。例外的是沈从文，虽不像前几位学家那样深厚，但是，其家乡浓厚的荆楚文化之风浸染着他，使他与传统文化能够自觉呼应。在他们的文学批评中，这种古典精神已经浸入骨髓，化为血肉。

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发展与建构过程中，批评家们在西学中获得一种世界的眼光，于本土语境中又形成本土意识，二者结合使他们对西方文艺批评进行了自觉地过滤，并将其与中国古典传统会通，形成具有现代品格的现代批评理论。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文学批评始终以现代文化变革作为助推的动力源，以西方文艺理论为参照系，蕴含着中国古典的传统风貌。学者王一川对此有较为深入的分析，他认为：

① 王一川：《批评理论与实践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49页。